

# “他者”视角下的中国军民抗战

郑志远 张煜

近年来,抗战史研究呈现明显的“微观转向”,研究者日益关注普通个体在历史进程中的体验与表达。正如黄道炫曾在研究中多次指出,有价值的记载并不一定出自大人物之手。战场上普通士兵的非公开个体记事,往往比官方档案更能透视真实的历史细节。这一研究视角的转换,不仅丰富了历史叙事的层次,也为理解复杂历史现象提供了新的路径。

敌伪日记(日记、家书等)作为记录战争直接参与者、施害者具体心态的第一手资料,虽不可避免地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却也从反面印证了中国军民抗战的真实面貌,为抗战历史提供“他者”镜像下的史料支撑。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基于敌军私人记录,分析中国抗战中群众路线、游击战术及军队战斗意志在敌军视角下的呈现。

## 一、“军民难辨”:群众路线的敌军视角印证

华中方面军官官兵私记中,“军民难辨”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这源于中国抗战中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即军事力量与人民群众的深度融合。在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共着力推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同时积极开展民运工作,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抗战后期,华中抗日根据地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减轻农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赢得各阶层民众的支持。这种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做法,使中共真正成为民众的“子弟兵”,为全民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松岛博,于1940年被派往华中地区,并在日军占领区内服役。他在日记中写道:“昭和13年11月石谷部队最初来到此地时,听说吃了不少苦头。到处都是敌人。在部落中前行,或是道路上行走都有危险,所以都是一边砸碎民家的墙一边扫荡前进。”这种如履薄冰的行军状态,反映了日军在群众战争环境中所处的被动局面。

第十军在登陆杭州湾之前,参谋长向各部队发出的“军参谋长注意事项”中,包含一条关于“注意中国居民”的指示:“在华北,特别是上海方面之战场,普通居民,即使是老人、妇女、儿童充当敌

之间谍,或把日军的位置告知敌军,或诱导敌军袭击日军,或危害单独日本士兵等难得疏忽的事例甚多,因此,必须予以特别注意,特别是后方部队,更是如此,在确认为如此的情况下,决不宽容,应采取断然处置。”

作战指示从敌伪视角印证了中国军民抗战的高度一体化。从华北到上海,普通民众深度融入抗战体系,承担情报传递、作战引导甚至直接袭击等任务。该指令将全体居民视为“不可掉以轻心”的抵抗力量。

在面对日军“讨伐”时,军民同样紧密协作,抵御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这表现在高效的情报工作方面。在日军讨伐前,中共能在群众的帮助下得到准确情报,做好战斗或转移的准备,所以日军形容“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白,宛如坠入五里雾中,进行难以捉摸的作战”。这种“情报失明”的困境,源于情报网络的广泛覆盖与高效运作。

中共情报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卓越成效,离不开群众的广泛支持。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群众主动为中共传递消息、监视敌人动向,形成了全民情报网络。敌伪在扫荡时发现,“日军所到之处,不见一个村民”。群众早已将日军的行动信息传递给共产党,并配合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其“抢无可抢,困饿交加”。这种“敌动我知,敌未动我先知”的情报优势,让中共总能占据战场主动,给敌伪造成了持续的心理压力。

## 二、“神秘莫测”:游击战术的敌军心理反应

华中方面军官官兵的私记中,不仅是战场动态的记录,更是侵略者在人民环境中,心理状态从盲目骄狂走向彻底毁灭的真实写照。这一心理嬗变过程,从反面印证了中国抗战战略——尤其是持久战与游击战对敌军精神意志的侵蚀。

侵华之初,敌伪普遍受爱国主义思想蛊惑,怀有极端的扩张傲慢,其心理基础建立在对日本军事力量与抵抗意志的严重低估之上。藤根籍兵士高桥千太郎,在信里吹嘘自己参加的“清丰城之战”“百花津之战”“百泉河边之战”等“快

举”。这种骄狂心理,在进入华中敌后战场后迅速遭遇了现实的挫败。随着游击战术展开,日军发现其预想的“速战速决”完全失败,高密度的微观抵抗开始消解其宏大叙事下的“必胜信心”。

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军民采取灵活机动的袭扰战术,敌伪长期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状态。这种“情报失明”与“处处遇袭”的困境,直接导致了敌军基层士兵心理防线的松动。1938年3月5日,岩崎昌治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即便是风吹的声音也会感觉到是匪贼。”这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源于其补给线与驻地时刻面临被渗透的威胁。1938年5月20日,日军士兵高桥长市在家书中写道:“敌人藏匿在铁路周围的麦田中,趁我方兵力薄弱便开枪射击或者炸毁铁路,使得我们必须时刻警惕。”战场压力使敌伪从肉体疲惫演变为精神萎靡,其侵略热情在无尽的损耗中逐渐被恐惧所取代。

到抗战后期,敌伪基层士兵对战争前途的绝望感已无法掩饰,甚至产生了一些带有荒诞色彩的病态认知,这恰恰反映了中国全民抗战对敌军造成的毁灭性精神冲击。士兵高桥政之在信中抱怨:“之前因为天气冷一直没出来的虱子,随着气温升高开始吸食士兵的身体,将兵们觉得连虱子都怀着抗日思想。”这一记录从侧面印证中国抗战“全民参与、无处不在”的深度。这种心理崩溃并非个案,而是随着持久战的推移,敌伪官兵在认识到自身陷入泥淖后的集体性反应。心理层面的惶惑与绝望,与日方高层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大东亚新秩序建设的真正敌人”的判断形成互证。

## 三、“勇猛精进”:中国军队抗战意志的敌军见证

华中方面军官官兵的私记中,反复印证着同一事实,即中国军队始终进行着顽强抵抗。其家信中留下了诸多相关记载:

“上海南京之间仅仅七十里的地方,我军吃了多少苦啊”(1938年1月14日,高桥忠光书简)

“工兵浑身是泥地过来讲着敌人防备之严,听见切齿扼腕。”(1937年9月11日,高桥忠光日记)

“这次的战斗在山里,敌人阵地相当顽强,友军损失相当。”(1938年3月12日,石川庄七书简)

#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几点思考

袁翔

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是新时代企业党建工作的核心任务,也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破解企业发展瓶颈、激活内生动力、凝聚全员合力的关键抓手,能够有效推动企业在复杂市场环境中坚守发展方向、筑牢发展根基。当前,部分企业仍存在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问题,党建工作脱离经营实际、作用发挥不充分,制约了企业发展动能的释放。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既是加强企业党建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发展难题、提升经营质效的关键举措,更是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 一、强化政治引领,锚定融合发展方向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首要任务是强化党建政治引领作用,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为生产经营锚定正确方向。坚持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环节,明确党组织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确保企业发展始终与党和国家

方针政策同频共振。通过加强理论学习,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引导企业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坚定理想信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发展战略上来。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将党建工作目标与经营目标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避免党建与经营“两张皮”,让党建引领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推动企业在合规经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中坚守正确方向,实现政治引领与经营发展的有机统一。

## 二、建强组织体系,夯实融合发展根基

建强基层党组织体系,是实现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坚实基础。坚持“应建尽建、设置规范、运转高效”原则,根据企业生产经营架构,合理设置基层党组织,将党组织建在生产一线、项目一线、班组一线,实现党组织覆盖无死角、党员作用发挥无盲区。加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完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等制度,结合生产经营重点任务设计党建活动载体,让党建活动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

党员突击队,引导党员在关键岗位、重点项目、紧急任务中亮身份、作表率,破解生产经营难题、攻克技术难关,以党员的先锋引领带动全体职工攻坚克难,夯实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组织根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 三、聚焦中心任务,激活融合发展动能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核心是聚焦企业生产经营中心任务,将党建工作贯穿于生产经营各环节,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力。围绕企业提质增效、科技创新、市场拓展、安全生产等重点任务,开展特色党建活动,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对接、同促共进。在科技创新领域,引导党员带头投身技术研发、工艺改进,攻克生产经营中的技术瓶颈,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安全生产领域,通过党建引领强化安全理念宣传、安全制度落实,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在市场拓展领域,鼓励党员带头开拓市场、服务客户,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同时,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建设,培育高素质职工队伍,凝聚企业发展合力,让党建工作成为推动生产经营提质增效的“红色引擎”。

仪式是历史的缩影,亦是信仰的载体。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延安时期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篇章。大批热血青年怀揣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奔赴宝塔山下,迎接他们的不仅有革命真理的指引,还有操场上、窑洞前的一场场庄严肃穆的红色纪念仪式。这些仪式不仅是宣传动员的有效形式,更是直击心灵的“大思政课堂”。回望延安时期的红色仪式,挖掘中国共产党纪念仪式的育人内涵,对于新时代用好这堂“大思政课堂”,引导当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他们并不是像在内地听说的那样很快就会逃跑,而是非常顽固,让我军甚是苦恼。”(1938年或1939年11月21日,石川庄七书简)

士兵甚至抱怨“之前因为天气冷一直没出来的虱子,随着气温升高开始吸食士兵的身体,将兵们觉得连虱子都怀着抗日思想”(并非详,2月1日,高桥政之书简)

战场亲历者的真实感受,与日本国内所宣传的“连战连捷”景象大相径庭。战场的实情颠覆了士兵关于中国军队的固有印象,瓦解了日本媒体制造的“陆军威武”“皇军至强”的舆论假象。正因如此,多数日本士兵都对战争的前途抱有疑虑。

更令敌伪感到战栗的是,这种抗战意志并非单纯的军事抵抗,而是源于严明的纪律与深刻的政治觉悟。1944年1月5日,日本天皇之弟三笠宫亲王在《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一文中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生活作风节俭,对民众纪律严明,日本军队无法与之比拟,直言“日本军队根本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对阵”。这种认知转向,从反面有力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装备劣势下,凭借卓越的战斗意志与政治觉悟,构建起了令侵略者无法逾越的精神屏障。

敌伪私人记录作为来自“加害者”的自供状,从侵略者角度记录了中国方面灵活高明的游击战术、坚韧的军队素质,刻画了中国抗日军民密不可分抗战图景,也映照出日军由狂妄走向迷茫的思想变化。这些记录不仅还原了抗日战场的真实状态,也客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所发挥的中坚作用。通过对敌军私人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人民战争的有效组织、灵活机动的战术体系以及严明的军队纪律,构成了中国抗战持久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而这些,恰恰是在侵略者最不愿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事实中得以显现的。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二战时期侵华日军私记中的在华暴行与心理书写研究”(25CSJ0209);202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日本民众与军队互动关系批判研究”(2025SJJZD016);2025年江苏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抗战时期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研究成果】

## 四、健全长效机制,保障融合持续深化

健全完善长效机制,是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持续走深走实的重要保障。建立健全党建与生产经营融合的考核评价机制,将融合成效纳入党组织考核和企业经营绩效考核,明确考核指标、细化考核标准,形成“党建引领经营、经营检验党建”的考核闭环,倒逼党建与经营深度融合落地见效。完善协同联动机制,明确党组织与经营管理部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定期沟通、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破解融合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强党建工作队伍建设,培育一支既懂党建、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提升党建与经营融合的专业化水平。

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思想上同心、目标上同向、行动上同步的有机统一。强化政治引领,建强组织体系、聚焦中心任务、健全长效机制,是推动融合走深走实的关键路径。实践证明,只有将党建工作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各环节,才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发展合力,破解经营难题。(作者单位: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 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渊源、时代内涵与实践指向

张叶

政绩观集中体现了党员干部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在实践中的具体反映,是引领履职尽责、推动事业发展的思想旗帜。因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对促进领导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检验、人民评判与历史验证的实际成效具有深远现实意义。

## 一、正确政绩观的理论渊源

正确政绩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文化滋养和实践传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其理论基础,确立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工作为人民谋利益,决定了政绩必须以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根本价值取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其文化滋养,“民惟邦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思想,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绩理念高度契合,经“两个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赋予

正确政绩观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是其历史传承,从革命时期为群众谋利益,到建设时期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再到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形成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科学政绩观体系。

## 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政绩观强调厘清“为何树立政绩、何为优质政绩、如何实现政绩”等关键议题,内涵丰富、导向鲜明。为民造福是价值取向,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政绩本质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实绩,必须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首要考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是重要的实践内涵。

新时代政绩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在政绩,绝不是片面追求速度规模的虚假政绩,要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城乡协同、物质精神文明相协调。显绩和潜绩相统一是显著特点。既要抓看得见、摸得着、见效快的显

绩,解决群众的现实困难;又要做实打基础、利长远、增后劲的潜绩,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杜绝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坚强党性是根本保证,党性决定政绩观,衡量党性的根本标准是公私二字。只有党性坚定、排除私心,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偏航,始终做到对党忠诚、为民造福。

## 三、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指向

践行正确的政绩观,重在知行合一、实干笃行,用具体行动创造过硬实绩。加强理论武装与思想建设。深入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解析政绩观的深层意蕴,明晰“树立何种政绩”“如何践行政绩导向”“依靠什么实现政绩目标”的根本要义,务求为民宗旨。弘扬实干作风,坚持工作实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基层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用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靠实干出实绩。

坚持为民初心,增进民生福祉。将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整合资源聚焦就业、

教育、医疗、养老及住房等关键民生领域,系统解决群众关心的重点问题,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坚持系统观念,促进长远发展。树立全局和长远眼光,统筹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发展和安全,不搞短视行为、不做竭泽而渔式发展,夯实基础、久久为功。

健全考核机制,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完善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体系,突出为民造福、高质量发展、长远发展导向,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形成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

新时代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服务人民、推动发展,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仪式是历史的缩影,亦是信仰的载体。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延安时期无疑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篇章。大批热血青年怀揣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奔赴宝塔山下,迎接他们的不仅有革命真理的指引,还有操场上、窑洞前的一场场庄严肃穆的红色纪念仪式。这些仪式不仅是宣传动员的有效形式,更是直击心灵的“大思政课堂”。回望延安时期的红色仪式,挖掘中国共产党纪念仪式的育人内涵,对于新时代用好这堂“大思政课堂”,引导当代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一、以特定空间与庄严程序强化政治认同

特定的空间环境是仪式发挥教育作用的无声教材。不论是抗日军政大学的露天操场,还是陕北公学的简陋礼堂,甚至是黄土高原上的普通山坡,通过精心布置,都转化为了庄重神圣的教育阵地。在这些场域内,鲜艳的红旗迎风招展,领袖画像和苍劲有力的革命标语悬挂在醒目位置。当青年们踏入这样的环境,原本普通的场域便被赋予了深厚的革命意蕴,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感与崇高感充盈在心间。环境的熏陶让青年在潜移默化中端正了态度,为接受思想洗礼做好了心理准备。

庄严的程序则是实现身份转变与认同重塑的关键纽带。以延安时期各类干部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以及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为例,这些活动绝不是走过场的行政流程,而是严肃的政治教育。在开学典礼上,中央领导同志常常亲自到场作长篇报告,为青年透彻分析国内外局势;在入党宣誓时,面对党旗举起右拳的那一刻,青年们不仅是在宣读誓词,更是在内心深处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仰。通过这些严密而庄重的程序,无数刚刚走出书斋的爱国学生,迅速褪去了思想上的青涩与迷茫,完成了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身份跃升。仪式赋予了他们强烈的组织归属感,使他们能够始终保持良好的清醒与坚定。

## 二、以群体共鸣与情感交融深化价值内化

思想政治教育如果缺乏情感的支撑,就容易沦为枯燥的说教。延安时期党的红色纪念仪式之所以具有穿透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它善于通过群体的共鸣与情感的交融,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青年群体内心深处的价值追求。

集体活动的参与打破了个体隔阂,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向心力。在延安的重大节日纪念活动中,如“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纪念日等,集会、游行、合唱往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当成千上万的青年汇聚在一起,齐声高唱气势磅礴的革命歌曲,齐声高呼响彻云霄的抗战口号时,个人的声音便汇入了时代的洪流。这种高度一致的集体表达,让每一个参与者都深刻感受到自己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宏大革命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集体欢腾的热烈氛围中,个体的情感被放大并与群体交融,实现了思想感情的全面共振。

特定主题的纪念仪式更是在悲壮与崇高交织中深化了价值内化。延安时期,党中央多次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如追悼阵亡将士、追悼鲁迅、追悼张思德等。在这些肃穆的仪式上,不仅有对逝者的深切哀悼,更有对革命精神的生动诠释。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将一个普通战士的牺牲升华为全党全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青年们在参与仪式时,不仅是在缅怀先烈,更是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教育。他们从英雄的事迹中汲取精神养分,将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牺牲,什么是奉献。

## 三、以青年主体与基层实践赓续红色基因

历史的经验只有与现实的工作相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新时代高校在运用红色纪念仪式这堂大思政课时,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将历史的启示转化为现实的教育路径。

首先,要突出青年学生的主体地位,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延安时期的纪念仪式具有鲜明的群众性,青年不仅是受教育的对象,更是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建设者。当前,高校在组织升旗仪式、五四青年节表彰、烈士纪念日祭扫等活动时,应坚决摒弃单向灌输的模式。要充分信任学生,将活动的前期策划、流程设计与现场组织等环节交给青年学生去主导。让青年在搜集历史资料、撰写串场词、编排文艺节目的筹备过程中,完成深刻的自我教育。只有当仪式成为青年自发的情感表达场,红色基因才能真正触动他们的灵魂。

其次,要坚持知行合一的教育原则,将仪式的热情转化为扎根基层的实践行动。延安时期的仪式教育从来不是局限于会场之内,而是紧密联系实际,直接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前线工作。新时代的高校思政教育同样需要打通从理论到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绝不能让仪式的庄严感仅仅停留在现场的几十分钟,必须将其顺畅地导向长期的社会服务中。要引导青年学生走出校园,将仪式上激发的责任感带入日常的志愿服务积累中,带入基层一线部门的实践锻炼中,用扎实的行动去印证仪式上许下的誓言,把真才实学奉献给社会。

延安时期的红色纪念仪式是一座思想政治教育的富矿。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从中汲取智慧,用好这堂大思政课堂。通过不断创新仪式的表现形式和实践载体,让历史的庄重感与时代的新要求在青年心田产生共振,引领广大青年在接续奋斗中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篇章。

(作者单位:西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冯星渊

# 延安时期党的红色纪念仪式的『大思政课堂』意蕴及时代建构

